责任编辑 任 杰 编辑 蒋小博 范博宁
版式设计 裴育卓 校对 李 荔

胡金生 散文作品

那年我十七岁

那年,我十七岁,恰是青春正好的年纪,懵懂中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。1981年的夏天,我初中毕业,迎来了那场仿若能决定命运的中考。

彼时,县重点高中在所有学子心中,宛如神圣的殿堂,如果考上,那是学生无上的荣耀,亦是老师和家长的骄傲。在村里,谁家孩子要是能踏入这所学校,那是无比风光的事。正因如此,老师常常以考上县重点高中为激励,鞭策我们奋力前行。

那年,还传来一个令我振奋不已的消息:我们可以在报考高中的同时,参加师范学校的考试。师范学校虽只是中专学历,但对我们这些农村家庭的学生而言,无疑是天大的喜讯。因为三年毕业后便能踏上工作岗位,而且读书期间全是公费,就连吃饭都不用家里花钱。一般情况下,农村家庭孩子多,一些孩子初中毕业即便考上高中,后续还要读大学,大学毕业才能工作。所以,考上师范学校,就成了众多农村学生和家长梦寐以求的事。

不过,报考师范学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,每所初中会依据毕业生人数确定名额。我所在的乡镇中学仅有七个名额。为了保证公平,学校组织了一次"预选"考试,按照成绩,取前七名。我那时贪玩,成绩起起落落不稳定。父亲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,夜深人静时,他躺在被窝里苦口婆心地教导我,可我因白天玩得太累,听着听着便进入了梦乡。

预选成绩揭晓,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同学身后,紧张地望着榜单,心里其实没抱多大希望。然而,当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,且恰恰是第七名时,惊喜瞬间涌上我的心头。就这样,我幸运地成为了七名有资格参加师范学校考试的同学之一。

虽说获得了考试资格,但究竟能不能考上师范学校,我心里也没底。根据以往的经验,每个学校能考上一两个人就已经很幸运了,有的学校甚至一个都考不上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报名的同学考高中,考高中和考师范学校用的是同一张试卷,没考上师范学校依然有机会被高中录取。

考试在县城进行。头一天,我们七个同学结伴来到县城,住在站前的东方红旅社。或许是第一次离家,又或许是考试带来的紧张感,六个同学都失眠了,而我却毫无压力,早早便酣然入睡。

考试结束后,大家各自散去,回家等待消息。我感觉自己考得还不错,除了英语,其他科目都答得满满当当。说来也巧,考数学的前一晚,我和史军大哥一同研究了一道几何题,他巧妙地画出了一条辅助线,成功解出了此题。没想到第二天考试,这道题竟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试卷上,让我欣喜若狂。而史军大哥却因紧张,把这道题忘得一干二净,懊恼不已。

等待考试成绩的日子,让人难熬。

父亲见我无所事事,便让我去镇上的砖厂打工,他当时担任砖厂的书记。我干活儿的地方是"筛灰"车间。为了增加红砖的内燃效果,需要在黄土里掺入煤矸石的灰,再制成砖坯子,放入砖窑烧制,这样就成了建筑用的红砖。煤矸石粉碎后,得人工用筛子筛好,只有细矸石灰才能加入土中制砖。

车间主任是个戴眼镜的小老头,姓韦,父亲让我叫他韦老舅。他极为和善,总是亲昵地叫我"小生"。起初,他安排我"扬灰"。这活儿不算太累,可一旦刮风我就遭了殃,煤灰直往脸上扑,还常常迷眼睛。一天活儿干下来,我满脸黢黑,再一出汗,一道道的,活像个小鬼儿。

韦老舅看出我不乐意干这活儿,便让我去推车。推车还有歇着的时候,灰没筛出来就闲着,灰攒多了就连续推几车。那车是独轮车,刚开始推,我掌握不好平衡,翻了好几次车。后来,渐渐熟练了,我便一直干这个活儿。有时候,韦老舅看我累了,还会过来替我干一会儿。那年夏天格外炎热,我每天都出一身汗,下班后我就急匆匆往家跑,然后"扑通"一声跳进家门前的小河里。只有在那一刻,我才能忘却浑身的疲惫。我也曾嗫嚅着问父亲,这活儿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?我实在不想干了。父亲笑着说,要是考不上高中,就转正了,要干一辈子呢!这话差点儿把我吓个半死。

一天中午,酷热难耐,我躲在砖厂马厩的小炕上睡觉。到了下午上班时间,我依旧不愿动弹,便继续睡懒觉。韦老舅看我不想起来,就说:"小生,你再歇会儿吧,我先替你干。"不知过了多久,我正睡得迷迷糊糊,突然听到父亲的声音:"都几点了?还想不想干了?"我赶忙一骨碌爬起来,极不情愿地来到车间。

韦老舅看出我满脸的不情愿,关切地问:"小生啊,你咋了?是不是中午没吃饭啊?"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,稀里糊涂就顺着他的话点了点头。没想到韦老舅当了真,说:"哎呀,不吃饭可不行啊!"他用满是煤灰的手在衣兜里掏了半天,掏出皱巴巴的两元钱,硬塞给我,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去街里买几个包子吃。我实在推辞不过,再加上刚睡醒确实不想干活儿,就骑上他的自行车走了。

我买了几个包子,勉强吃了一个,因为我中午吃过饭了,并不怎么饿。回到车间,我把剩下的钱和包子递给韦老舅。他拍了拍手上的煤灰,拿起包子,蹲在旁边一个阴凉的地方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不一会儿就把几个包子都吃完了。看到这一幕,我鼻子一酸,眼泪夺眶而出,心里五味杂陈,耳边仿佛有个声音在回响:欺骗善良的人是有罪的啊!

那时,条件艰苦,因为砖厂离家很远,中午要带饭盒。厂里有个食堂,主食几乎天天是锅贴玉米饼子,二分钱一个,还有白菜或萝卜丝汤。我不太喜欢吃玉米饼子,因此,很少去食堂吃饭。不过说真的,现在回想起来,砖厂当年的玉米饼子还是很有特色的,面发得很好,并且每个饼子都是一样大小,黄澄澄的,刚出锅时散发出浓浓的香气。有一次,食堂改善伙食,蒸了一大锅白面馒头,大家奔走相告,不一会儿就抢光了。有个山东大汉老裴,一口气吃了十多个白面馒头。

有一次,我带的午饭是高粱米饭,菜是土豆片炒辣椒,母亲还特意放了几片肉。厂子里有个工人外号叫"懒猴子",听说他是光棍。我那时长得小,平时他就总和我闹,逗我玩。这次非要看看我带的是啥饭,我没他劲大,他几下子就把饭盒抢去了。他打开饭盒说:"哎呀!伙食不错啊,还有肉呢!"然后操起勺子就吃,快把菜吃光了才停下来,差点儿把我气哭了。

时间过得无比缓慢,我在砖厂大概干了二十来天,却感觉好似过了好几个月,看不到一丝希望。考试什么时候出成绩,一点儿消息都没有,这里仿若与世隔绝一般。我心里犯起了嘀咕,莫不是已经发榜了,而我啥都没考上吧?唉,又能有什么办法呢?

心中尚存着一丝希望,却又不知向谁倾诉,我就这样一天天地煎熬着。

这天下午,我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独轮车旁,太阳懒洋洋地高悬在头顶,离下班还有两个多小时。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传来,我抬头望去,顿时愣住了。只见父亲满面春风地骑着自行车赶来,快到我跟前时,才"嚓"地一声捏紧车闸,跳下自行车,冲我大声喊道:"儿子,不干了,走,跟我回家。"

我有些发蒙,没听明白。韦老舅也赶忙迎上前,笑着问:"胡书记,出啥事了?"

只见父亲笑得愈发灿烂,我好像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开心。父亲冲着韦老舅,也冲着一起干活儿的所有人高声说道:"考上了,我儿子考上了!"然后,两手把自行车提起来,猛地来了个大转身,我赶紧坐在后座上,我们父子俩扔下众人,得意洋洋地走了。

路过街里的"青年肉店"时,父亲买了一块猪肉。一路上,父亲一句话也没跟我说,我也没敢多问。

到家才知道,我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学校。我们预选上的七名同学中,只有我考上了,其他同学都考上了重点高中。我们全家都欣喜若狂,母亲和姐姐们都夸我有出息。那天晚上,我们全家吃了一顿白菜猪肉馅饺子,那滋味,真是香极了!

护 秋

李德霞

吃罢晚饭,爹摸起旱烟袋,嘴巴一瘪一瘪地抽旱烟。

队长来了,他是来给爹派活儿的。爹把旱烟递给队长,队长吧嗒几口,说:"今年的护秋员,由老李你来当,你没意见吧?"

护秋员的职责其实就是看护北滩地那三十几亩红高粱。

爹一听,又是摆手,又是摇头,连声说:"队长,使不得,使不得啊。"

"咋使不得?"

"我这人心太软,干不了护秋员这个差事。再说,二黑都当护秋员两年了,干得好好的,为啥换人?"

"二黑,那是个愣头青。他当护秋员两年,折了我两个社员,你不知道吗?"

爹当然知道。

二黑当上护秋员的第一年。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,王海摸黑掐了队里五穗红高粱。王海成分不好,口粮分得少,肚子饿,才铤而走险的。王海被二黑发现后,拼了命地往前跑。二黑不甘示弱,猛追不舍。追出有二里地,换别人,也就放弃了。可二黑是个"一根筋",非但没停,追得速度更快了。王海慌不择路,扑通一声,掉进两丈多深的一口枯井里,摔断了腰椎,成了瘫子。

去年,刘四毛饿得扛不住,掐了两穗红高粱,被二黑当场抓住。一个要跑,一个不让。推搡当中,刘四毛一个趔趄,仰面倒地。也就那么巧,后脑勺磕在一块石头上,昏死过去。住了半年医院,命是保住了,人变得疯疯癫癫。

队长说:"再让二黑当护秋员,指不定还要折几个社员呢。"

爹说:"我就怕护不住那些红高粱。到时候,咋向你交差?"

队长说:"你的任务很简单,每当夜深人静时,你提一面锣,绕高粱地转一圈儿,走一步敲一下锣,然后回家睡觉。"

爹问:"那要是丢了高粱呢?"

队长笑笑说:"老规矩呀,丢一株高粱穗,扣你三分工;五天没丢高粱,奖你二分工。"

第二天,队长果然派人给爹送来一面锣。

每到夜里十二点,爹提着锣到高粱地里走一圈,"镗镗"的锣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很远。

还别说,自从爹当上护秋员,乍一看,地里的高粱好像真的再没丢过一株。

后来,细心的爹才发现,不是高粱没丢,而是偷高粱的人变精了,他们不单单只掐高粱穗,而是连高粱秆一块拔走,再把地面弄平整。

爹知道,偷高粱穗的人,要的是高粱穗,而不是高粱秆,他们一定把高粱秆藏匿在一个什么地方了。

爹以高粱地为中心,逐步向四周搜寻,终于在二道河的转弯处找到了一堆半干的高粱秆。他数了数,竟有五十多根。

爹把高粱秆捆成一捆扛到队部,交给队长。队长问:"你每晚敲锣不?"

爹说:"每晚都不落空。"

"好,我知道了。这些高粱秆,我让会计给你记着。"

日子在爹的锣声中悄然滑过。

高粱收割后,爹的护秋员工作也告一段落。

当然,爹也知道,在他当护秋员的几个月里,贼没抓到一个,高粱穗倒是丢了不少,光扛给队长的高粱秆就有一千多根。一根扣三分工,一千根就要扣掉三千分工;十分工算一个工,就是三百个工,正好是一个壮劳力一年的工分。也就是说,爹这一年算是白忙活了。

爹钻进下房,找来一条破布袋,让娘给补上窟窿。娘问:"你要干啥?"

"我去要饭啊。不然,咱们一家三口喝西北风啊?"

娘说:"要饭我陪你去,你走南,我闯北,要得不是更多?"

就在爹娘要去要饭的那天,队里很久不响的大喇叭响了,是会计公布社员新口粮的名单。

谁也没想到,爹分的口粮是全队社员中最高的一个。

爹找到队长说:"新口粮下来,我的口粮咋是最高的,是不是弄错了?"

队长说:"你白天上工,晚上敲锣,挺辛苦的,这叫多劳多得嘛。"

"可是,我给丢了一千多根高粱呢。"

队长说:"我问你,是高粱重要,还是社员重要?一千根高粱能抵得过一个社员不?"

"当然抵不过啦。"

队长拍拍爹的肩头说:"来年,咱队的护秋员还由你来当!"